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回顧與反思：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歷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AO, Shini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4 21:52:41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888">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888</a>

## 回顧與反思：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歷程

高師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碩士

杜爾凱姆（Émile Durkheim）在其經典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一書中，首次明確地指出，「宗教明顯是社會性的」，<sup>1</sup>從此宗教社會學這門學科登上了學術界的舞台。宗教社會學在國外大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已經發展了一個多世紀。儘管已經產生了許多大師、名著、理論、學派、學會、專業刊物，每年舉行不少國際學術會議，但是隨着用科學方法對宗教進行研究的需要日益增加，這門社會科學現在還在以加速度快步發展。

這一領域的研究在中國大陸起步很晚，基本上是一九八〇年代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從國外引進的。儘管只有二十來年的歷史，但要對中國大陸宗教社會學研究作一個回顧與反思，也並非易事。原因在於，首先，隨着中國社會近三十年來的飛速發展、各個宗教迅速復甦、非常興旺，為研究者提供的天地極其廣闊，資源極其豐富又變化多端，這種回顧與反思要顧及宗教狀況往往難以全面；其次，儘管目前大陸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隊伍還不夠成熟，各方面也

---

1. 杜爾凱姆著，渠東、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1。

參差不齊，但是研究隊伍日益龐大，研究成果多彩多姿，即便是再全面的回顧與反思也可能掛一漏萬。然而，這項工作似乎是繼續前進所必須的。希望我們的回顧與反思帶給宗教社會學界的同仁們更多的思考，更好地促進此學科在中國的發展。

我曾經從時間上將此一領域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過去——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現在——二〇〇〇年《宗教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的出版到方興未艾的今天。這種以發展階段為線索的回顧，主要是想強調，宗教社會學靠引進移植，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學術基礎，經過十多年的基本建設，目前已經在大陸生根開花，結出了豐碩的果實。<sup>2</sup>那種寫法的優點是發展脈絡清晰可見，而缺點是分析挖掘不夠深入。事實上，回顧與反思的方式是多樣的，為了更好地進行這項工作，我們在此試從多個方面來回顧與檢討過去。

## 一、

### 1. 學科認識的逐步變化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起，一些開始涉足此學科的學者都對「宗教社會學」作出了界定。一般而言，這些界定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強調宗教社會學是宗教學的分支學科，二是強調宗教社會學是宗教學與社會學交叉的邊緣學科。同時，在對這些界定的進一步說明中，「實證性」與「科學性」作為宗教社會學的特徵得到強調。<sup>3</sup>然而，在這門學科的起步階段，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與「科學性」

2. 參見拙文〈宗教社會學在中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2004）。

3. 可參見《社會科學新方法大詞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宗教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宗教學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戴康生、彭耀編，《宗教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孫尚陽，《宗教社會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等。

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甚至在認識上對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還有一些誤解和歪曲；而其「科學性」則更是被人們忽視。<sup>4</sup>

這類誤解、歪曲或忽視既來自宗教社會學界的外部，也來自其內部。一種看法是將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等同於僅僅是田野調查，並認為田野調查「沒有理論水準」，「容易得很，誰都可以做」。這種看法一般出自此學科之外的某些人士。在中國大陸，由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從歷史、文學、尤其是哲學等人文學科進路來進行的宗教研究發展相當快，參與人員相對多，因此在言必稱巴特（Karl Barth）、蒂里希（Paul Tillich）等神學理論大師的話語範圍內，這種看法自然有其可理解性。另一種看法同上述看法相同，但卻出自一些以田野調查為進路開始從事宗教研究的人。一般而言，他們對宗教社會學的理解相對膚淺，有的甚至沒有意識到田野調查只是宗教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方法。一些研究者以田野調查起點，以田野調查報告為終點，始終將自己的眼界局限於田野工作；一些人甚至認為宗教社會學不需要甚麼理論，走出書齋就行了。在這種狀態下，田野調查被認為是「沒有理論水準」的人進入宗教研究的捷徑，也很自然。

這種誤解、歪曲或忽視在認識上的原因也許有幾個方面。首先，我們對於宗教社會學的理論介紹十分有限。儘管在這門學科引進中國之初，進入此學科殿堂的學者們翻譯介紹了宗教社會學的一些基礎理論，借用「他山之石」奠定了此學科的部分基礎，但是我們沒有一支既懂得宗教

---

4. 即使在美國，就連斯達克（Rodney Stark）等著名宗教社會學家也承認，「對於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缺少科學性，這種現象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觀」（見斯達克、芬克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

學、又兼通社會學的翻譯隊伍，因而翻譯的著作和論文數量極其有限，同時譯著與譯文也多屬於該學科早期的東西、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成果，未能收集到國外研究的最新資料；更談不上系統地翻譯整個學科的理論。其次，相對其他領域而言，宗教社會學方面的參與人員較少，更少有所謂科班出身的學者。如何將理論聯繫實際，如何用田野工作檢驗已有的理論，對於當時參與的所有學者而言，都是一個問題。第三，復興不久的宗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環境中仍然具有相當的敏感性，我們還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去進行實證研究，談不上用現有的理論去解釋中國的宗教現象，更談不上用實際的宗教狀況去驗證現存的理論了。正因為如此，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發展之初，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實證性與科學性的分離，幾乎是必然的現象。所以上述認識上的誤解、歪曲或忽視的存在，可以說也是難以避免的結果。

對於宗教社會學之實證性與科學性較全面的認識大致始於新世紀之初。在此我們應該提到為推動此學科在中國走向成熟而努力的楊鳳崗博士。<sup>5</sup>楊鳳崗博士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宗教學研究中三種不同進路的區別：神學的宗教學是從宗教內部進行的邏輯推演和論證；人文的宗教學是從哲學、文學、思想史等的角度對宗教的反思和闡釋；社會科學的宗教學則使用實證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質化的研究），收集實證的數據和材料，並且進行客觀的分析和歸納，從而得出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宗教現象以及宗教與社會其他方面的互動關係。科學理論以假說的形式存在，命題可以被實證材料證實或證偽，從而推動理論的發展。<sup>6</sup>楊鳳

5. 僑居美國十七年的楊鳳崗是宗教社會學專業的博士，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倡導和組織了三屆暑期宗教學高級研討班，推動和促進了對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全面認識。

6. 楊鳳崗，〈譯者前言〉，載斯達克、芬克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

崗博士還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中國當代宗教研究的局限，並指出，「缺乏社會科學的宗教學方法和理論以及對於當代宗教現象的興趣」，可能是中國宗教學研究仍然有限、仍然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sup>7</sup>

新世紀之後，隨着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理論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無形的宗教——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The Invisible Religi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sup>8</sup>《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的再發現》〔*A Rumor of Angels: 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sup>9</sup>《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的人之方面》〔*Acts of Faith: Explor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宗教社會學史》〔*Manulae di sociologia delia religione*〕<sup>10</sup>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社會學譯叢如《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sup>11</sup>《宗教的七種理論》〔*Seven Theories of Religion*〕<sup>12</sup>等）的出版，隨着為數不小的一批社會學出身的年輕學者的加盟，隨着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三期暑期宗教學高級研討班的落幕，對作為實證性與科學性的社會科學之宗教社會學的再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驚喜地發現，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將宗教社會的實證性與科學性自覺地結合；少數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但又不乏理論分析的專著和文章已經問世；在以宗教社會學為專題的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

---

7. 同上。

8. 盧克曼著，覃方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9. 貝格爾著，高師寧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10. 希普里阿尼、費拉羅迪著，高師寧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1. 斯塔克著，黃劍波、高民貴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 包爾丹著，陶飛亞、劉義、鈕聖妮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的思想境界和認識水準都有了較大的提高。<sup>13</sup>一言以蔽之，不論是宗教社會學領域之內還是之外，許多學者都認識到，宗教社會學不止是研究微觀現象的學科，田野調查並非宗教社會學的全部；相反，它關注的是宗教與人類發展的關聯，要解釋的是宗教「是甚麼」的現象，而不是要提出宗教「應該是甚麼」以及「應該如何」的問題。換言之，宗教社會學的科學性在於：客觀地反映宗教現象，儘量合理地解釋宗教現象。這種科學性必須建立在實證性之上，這不僅是此學科的特徵，也是其方法。可以說，宗教社會學為觀察宗教以及宗教行為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儘管我們認為這門學科提供的並不是關於人類行為的全部真理，但是它的確提供了其他研究進路無法發現的洞見。

正是在對宗教社會學的認識逐步深入與全面的過程中，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研究也開出了絢麗的花朵。

## 2. 學術成果的多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是宗教社會學引進中國的時期。此時，宗教社會學的當務之急是引進他山之石，出版翻譯著作。儘管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一些涉及宗教的西方社會學名著已經有中譯本，例如杜爾凱姆的《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sup>14</sup>《社會學研究方法論》（*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sup>15</sup>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的《巫術、科學、宗教和神話》（*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sup>16</sup>等，但是宗教社會學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則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逐步翻譯

---

13. 後文所列的各種成果即例證。

14. 杜爾凱姆著，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15. 杜爾凱姆著，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16. 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的。其中有韋伯 (M. Weber) 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sup>17</sup>《儒教和道教》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sup>18</sup>《韋伯社會學文選》、貝格爾 (P. Berger) 的名著《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sup>19</sup>以及托馬斯·奧戴 (T. F. O'Dea) 的《宗教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sup>20</sup>約翰斯通 (R. L. Johnstone) 的《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sup>21</sup>以及前蘇聯亞布洛柯夫 (Yablokov) 的《宗教社會學》 (*Социология Религии*)<sup>22</sup>等等。除此之外，涉及宗教社會學的譯文也時有刊出，例如〈宗教與社會——功能理論述評〉、〈宗教現象的社會學研究〉、〈宗教和認識論——杜爾凱姆的宗教理論〉、〈宗教社會學和社會實踐〉、〈波蘭的宗教社會學研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宗教社會學〉、〈美國的國民宗教〉等。與此同時，介紹宗教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流派和評述各宗教社會學家的文章紛紛問世，如〈宗教社會學〉、〈西方宗教社會學關於宗教的定義和宗教性的測定〉、〈杜爾凱姆宗教社會學述評〉、〈宗教研究中的功能主義〉、〈貝格爾的宗教社會學〉、〈當代宗教社會學的發展〉等等。經過許多學者幾年的努力，由翻譯帶來的學科資料的建設開始起步。此外，國內學者也陸續出版了一些介紹西方宗教學研究方面的著作，比較詳

- 
17. 韋伯著，于曉、陳維綱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18. 韋伯著，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19. 貝格爾著，高師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0. 托馬斯·奧戴、珍妮特·奧戴著，劉潤忠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1. 約翰斯通著，尹今黎、張蕾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2. 亞布洛柯夫著，王孝雲、王學富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細地介紹了宗教社會學，如《西方宗教學研究導引》、<sup>23</sup>《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sup>24</sup>等。

一九九二年以後，隨着思想的進一步解放，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必然存在的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sup>25</sup>與《當代中國宗教問題的思考》<sup>26</sup>兩本著作，可以說是對這個問題探索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成果，《宗教社會學通論》、<sup>27</sup>《當代新興宗教》、<sup>28</sup>《宗教社會學》（戴康生主編本）等著作也相繼問世。上海辭書出版社將原《宗教辭典》擴充為《宗教大辭典》，增補了宗教社會學方面的詞條大約近五十條。由於改革開放打破了過去的一些禁錮，一些學者走出了書齋，開始了田野工作，發表了不少田野調查的報告或論文。<sup>29</sup>

綜觀上述種種成果，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在選題上的特徵：或是以介紹學科為主，或是關於宗教與社會主義關係的討論，局限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相適應的問題。許多論文還殘留着以往意識形態的影響，仍然在小心翼翼地論證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宗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相適應。在實證研究方面雖然並非空白，但是其結果一方面卻受到研究的條件和社會環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研究方法欠缺的限制，<sup>30</sup>並沒有引起更多的反響。

---

23. 卓新平編、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4. 蘇國勛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羅竹風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26. 聶志恬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

27. 陳麟書、袁亞愚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28. 戴康生主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29. 筆者個人認為，從學科角度上說，此時期的許多經驗研究方面的成果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社會學成果，因而未將之一一列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研究在資料積累方面和開闢實證研究道路方面的意義。

30. 例如，調查地區過窄，問卷設計過寬，發放和收回有限，出版受限等等。

在宗教社會學逐漸走向成熟之時，此領域的研究逐漸出現了熱潮：所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在數量上顯然比過去要多，學者的視野也在逐步擴大。例如，從研究中國人的宗教性到宗教心理，從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到中國城市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從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到轉型時期地區性的基督教；從佛耶共存的個案研究到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從民間宗教的復興到準宗教、偽宗教、新興宗教的出場，再到對中國宗教組織結構和類型特點的研究等等。已經出版的專著，如《麥芒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sup>31</sup>《中國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認同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sup>32</sup>《聖山腳下的十字架——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sup>33</sup>《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sup>34</sup>《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sup>35</sup>《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Y縣X鎮基督教會組織研究》、<sup>36</sup>《信仰、革命與權力秩序——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sup>37</sup>《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詮釋》<sup>38</sup>等等，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田野調查和論證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或「相協調」的範圍，逐漸進入了有意識的、有理論反思的研究境界。

以論文為形式的研究成果，更是體現了宗教社會學實證性的特徵，例如，《當代宗教研究》二〇〇〇年以來刊登了如下相關論文：〈彙海市南匯縣下沙鎮飛橋村談家宅天主教

---

31. 吳飛著，（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

32. 梁麗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33. 吳梓明等，（香港：道風書社，2005）。

34. 高師寧，（香港：道風書社，2005）。

35. 陳村富，（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36. 李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37. 李向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8. 李向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情況調查》(趙文, 4 [2000])、〈荊州市荊州區宗教的現狀與管理〉(宮哲兵, 1 [2000])、〈「朱家角的宗教——兼談宗教活動場所的旅遊景觀功能」(吳亞魁, 4 [2000])、〈關於甘肅省中青年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建設情況的調查報告〉(牟本理、郭長東、馬虎成, 2 [2001])、〈天門市宗教教職人員情況調查散記〉(宮哲兵, 3 [2001])、〈峨眉山地區的天主教情況〉(周太良, 4 [2002])、〈皖西北農村基督教信仰狀況探析〉(王申紅, 2 [2002])、〈論宗教體驗對皈依的影響——一項個案研究〉(盧雲楓, 2 [2002])、〈炁道長存——對諸翟關帝廟的調查研究〉(王婕婷, 4 [2004])、〈社會變遷中的鄉村基督教及其問題〉(朱文娟, 2 [2003])、〈三一教：鮮活的民間宗教——福建瀟田地區(以象山村為樣本)三一教狀況田野調查〉(何善蒙, 1 [2004])、〈宗教場所合理佈局芻議——以上海基督教活動場所的佈局問題為中心〉(李向平, 2 [2005])等等。《世界宗教研究》此期間所刊登的相關論文有〈關於「天課」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度的調查研究——以雲南省沙甸、雞街鎮穆斯林的天課為例〉(楊志銀, 1 [2000])、〈關於宗教認同的調查分析〉(梁麗萍, 3 [2003])、〈一處罕見的民間宗教的「活化石」——太興山民間宗教歷史遺存調查〉(李立安, 3 [2003])、〈「信仰但不歸屬」的佛教信仰形式——以浙閩地區佛教的宗教生活為中心〉(李向平, 1 [2004])等。《基督教文化學刊》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刊登了一組關於實證研究的論文有〈實證透視：少數民族社區中的基督教——雲南省瀾滄縣兩個拉祜村寨典型調查〉(蘇翠薇、韓軍學)、〈調查報告：北方某沿海城市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倫理〉(黃劍波、楊鳳崗)、〈關於上海農村民間信仰活動調查〉(羅偉虹)等。其他刊物或文集

如《宗教學研究》、《宗教與文化》、《中國宗教》、《青年研究》、《社會學研究》、《浙江學刊》、《東華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汕頭大學學報》、《理論界》等等，也刊登了此領域的一些研究論文，如〈川西藏區的民間宗教形式〉（石碩，〈《宗教學研究》4〔2002〕〉）、〈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左鵬，〈《青年研究》5〔2004〕〉）、〈當代農村基督教信仰調查〉（杜景珍，〈《中國宗教》1〔2004〕〉）、〈群體符號邊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體為例〉（方文，〈《社會學研究》1〔2005〕〉）、〈社會轉型期青少年弱勢群體的信仰嬗變——南京市青少年宗教信仰狀況的調查與分析〉（沈如發，〈《當代青年研究》3〔2001〕〉）、〈對大學生宗教曖昧現象的透視〉（趙斌，〈《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1〕〉）、〈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青少年信教狀況的調查——以浙江省為例〉（〈《當代青年研究》6〔2004〕〉）、〈關於遼寧中老年女性宗教信仰狀況調查分析〉（徐海燕，〈《理論界》5〔2005〕〉）、〈改革開放與基督教在我國沿海農村的變遷——基督教在斜僑鎮發展狀況調查與思考〉（閉偉寧，〈《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01〕〉）、〈從實證研究看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高師寧，〈《浙江學刊》4〔2006〕〉）等等。

新世紀以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也涉及宗教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例如《當代中國基督教會個案分析》（王瀟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0）、《社會轉型與中國基督教——關於南充地區基督教的田野調查報告》（王再興，四川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2003）、《儀式中的宗教行動者：海澱堂基督徒行為模式研究》（李康樂，北京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蘭州市基

《基督教青年教會唱詩活動初步調查與研究》（周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衝突與適應：對當代農村宗教信仰的社會學思考》（曾強，北京中央黨校碩士學位論文，2004）、《歸信過程中的宗教供求關係——對一個彝族基督徒群體的實地研究》（楊驍勇，四川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2006）、《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的互動——北京市朝鮮族基督教個案研究》（李海淑，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當代中國人宗教信仰的變遷——深圳民間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范麗珠，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論文，2000）、《小區神崇拜與村廟信仰共同體：福建民間信仰的宗教社會學研究》（甘滿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四人堂」紀事——中國鄉村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黃劍波，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鄉村都市化與宗教信仰變遷：山西平陸張店鎮個案研究》（劉志軍，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等等。

此外，二〇〇六年七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上，學者們提交了近三十篇論文。此次研討會給人最深的印象，是眾多學者用當今最走紅的「宗教經濟論」作為理論基礎，來解釋、分析、反思中國的宗教現象。例如有以下一些論文：〈發現信仰市場：從宗教經濟學得來的啟示〉（張志鵬）、〈基督宗教實證研究中的兩點思考〉（高師寧）、〈丙中洛多元宗教並存格局形成過程中的宗教市場理論淺析〉（李萍）、〈中國宗教的三色市場〉（楊鳳崗）等。

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其研究成果經歷了從譯著、介紹為主的初創階段，以及從跟隨意識形態的「相適應」論證，到自覺地從田野調查入手的相對自由

的學術研究階段，此變化不謂不快。這些成果體現出來的階段性，表明了此學科在中國大陸成長與中國社會發展開放的關係。當我們的社會更加開放時，宗教就表現了其應有的活力；而研究對象的豐富多彩，又是此學科興旺發達的前提。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其宗教現象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任何一種宗教現象也許都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宗教狀況，同樣，任何一個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掌握中國宗教的全局。正因為如此，每一個研究的獨特性將組成整個中國宗教之獨特性，從每一個局部的、地域性的研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宗教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

### 3. 學科隊伍的擴大

一個學科的興旺還有一個標誌，即參與人員的數量。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發展速度相當迅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參與人員的增加。今天，我們的研究隊伍可以用「浩浩蕩蕩」來形容了。研究人員的構成主要有幾個方面：宗教社會學或宗教學「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改行」或「轉業」的研究者、社會學方面的專業人員，以及正在高等學校學習的學生。

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員大致可以分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和之後的幾批，各批研究者的情況不盡相同。例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所謂科班出身的研究者，實際上多為自學成才者，多半沒有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因為中國學術和教育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斷的非常狀況，儘管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就已經招收了宗教學專業的碩士生，以後多年間，少數高等院校也相繼開設了宗教學專業，然而，由於師資和其他方面的限制，

宗教學只是一個與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研究並列的專業方向，並沒有細分宗教社會學之類子專業，可以說在宗教研究方面，無論是導師還是學生，都是在「摸着石頭過河」。學生多以自學為主，由於國內圖書資料的嚴重不足，學生的學術視野也受到極大限制。而新世紀以後，由於宗教社會學資料增多，學者對之的認識逐漸增多，少數人開始以宗教社會學為專業，他們甚至在求學期間就參與了許多田野調查工作。他們有一定的宗教知識，有良好的外語基礎，能夠比較快地了解國外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動態和理論信息。近年來，海外歸來的宗教社會學專業人才也在逐漸增加，他們受過比較系統的專業訓練，在理論方面的優勢十分突出，一旦積累了關於中國宗教現狀的經驗知識，就能很快在此學科中發揮極大作用。

事實上，當今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仍然多半是「改行」或「轉業」的研究者，這本是中國宗教學研究的一大特色。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備受摧殘，甚至完全停頓多年，造成了學術研究斷代、學科設置不全的局面，這一缺陷絕非短時期內能夠彌補。改革開放之後宗教的復興與發展，推動了宗教研究前進的步伐，宗教研究刻不容緩，時不待人。在這種狀態下，許多學者在自己原有的知識框架內，找到與宗教研究接軌的最短路線，改行或轉業加入宗教研究的隊伍。在宗教社會學領域，有來自不同人文領域的學者，他們的參與給宗教研究帶來了新的力量和開闊的眼界。

在今日中國的宗教社會學研究領域，我們發現有為數雖然不多，但水準不低的論文，這些論文的作者大都來自社會學專業。當中國宗教研究熱潮形成之後，社會學界以宗教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主題愈來愈多，有些學者乾脆就加入了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隊伍。這類研究人員具有社會學專

業的素質，掌握了一定的社會學方法，因此其研究的「科學性」更加顯而易見。

在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隊伍中，我們還必須提到現在還正在學習宗教學的研究生。由於許多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上海大學等等）開設了宗教社會學專業課程，一批以宗教社會學為專業的研究生正在迅速成長。他們熱愛自己的專業，有一定的學術熱情，他們中的一些人參與了導師們的研究課題，利用寒暑假回自己的家鄉進行田野調查；一些人從自己身邊的宗教信徒開始進行訪談；一些人用自己的相機、錄音機記錄下了自己生活中的宗教現象。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六年，由中國人民大學承辦的三期中美歐暑期宗教學高級研討班已經對近二百個人次的年輕學者進行了培訓。對他們而言，儘管目前主要是積累知識和體驗的階段，但是有他們的參與，宗教社會學研究不僅後繼有人，而且其長足發展也有了希望。

#### 4. 其他方面

經常舉行學術會議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誌。二〇〇三年十月，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與美國舊金山大學利馬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牽頭，召開了「當代宗教與實證性研究方法」的小型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小批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學者首次相聚，認真而熱烈地討論了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和其中存在的問題。二〇〇四年七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再次發起召開了以「中國宗教社會學：現狀與走向」為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sup>39</sup>這是國內第一次明確地以宗教社會學為主

---

39. 會議期間，有學者提出了關於此次會議議題的問題，即應該是「中國宗教社會學」，還是「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外國學者也參與了討論。儘管會議還沒有對此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但是問題的提出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筆者同意美國宗教社會學家斯達克的看

題的學術會議。二〇〇五年七月，中國人民大學與雲南民族大學聯手，在昆明舉辦了以「社會科學視野下的宗教與民族」為主題的第二屆會議。二〇〇六年七月，「第三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的主題為：「宗教研究的新範式：探索與發展」，參與會議的中外港台學者、學生有共六十多名。這兩次會議的規模和論文水平，標誌着宗教社會學研究隊伍正在逐漸成熟，這門學科正在逐漸興旺。這些學科性的會議不僅為宗教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們相聚一堂、相互學習和交流提供了機會，也為新一代的研究者搭起了一個亮相的平台。

儘管意大利宗教社會學家希普里阿尼（Roberto Cipriani）曾說，「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的歷史與成功，並不一定或絕對地與學術出版物或者研究的數量和質量相關聯。」<sup>40</sup>我們仍然認為，一個學科是否成熟發展與興旺發達，學科性的專業刊物也是一個標誌。在中國眾多的學術刊物之中，宗教研究方面的雜誌在從來都是鳳毛麟角。在宗教研究發展迅速的今天，許多大學學報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期刊也已經開始為宗教研究開闢了天地。儘管如此，作為宗教學的一個分支，宗教社會學至今還沒有一個屬於自身領域的專業性的雜誌。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研究所將創辦《宗教社會科學研究》，這份雜誌必將凝聚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並為宗教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新一代提供一個學術討論的平台。

今天中國大陸的宗教社會學研究，逐漸走出了與世隔絕的環境，學者們已經逐步加入了此學科的國際研究隊

---

法：「如果宗教社會學只能適用於西方國家，就像一個只能應用於美國的物理學，或者一個只適用於韓國的生物學，那同樣都是愚蠢可笑的。」（見斯達克、芬克，〈作者致中國讀者〉，載斯達克、芬克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

40. 希普里阿尼著，高師寧譯，《宗教社會學史》，頁163。

伍。近年來，一些學者應邀參加了美國宗教社會學年會，不少著名的西方宗教社會學家也到中國大陸與會或講課，「走出去」和「請進來」已經愈來愈受到重視。

此外，我們也看到，近年來國家對於人文學科研究的支持力度在增加。就與宗教社會學相關的課題而言，據筆者所知，近年來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把中國宗教現狀、中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宗教與民族關係、轉型時期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研究列入了資助項目。一些民間資助的課題也開始加入了這個領域。這些都為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方面所必須的支持。

## 二、

### 1. 學科發展總體上的檢討

自杜爾凱姆與韋伯兩位大師的宗教社會學理論形成以來，宗教社會學領域就一直存在着兩大傾向。以社會靜力學方式探討宗教的傾向，主要關注的是「宗教是甚麼」以及「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是甚麼」的問題；而以社會動力學方式研究宗教的傾向，主要關注的是宗教對於社會發展和對於人類的「意義問題」。<sup>41</sup>在現代時期，國外宗教社會學領域呈現多元並立的景象，出現了許多新理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又逐漸形成了以「宗教市場論」為中心的新範式。這些思想和理論不僅為宗教社會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也成為此領域研究的方向。但是，總的說來，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比較隨意的，研究者受制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和研究條件，就整體而言，研究的方向不明確，也沒有很好地思考過需要解

41. 一些宗教社會學者認為「意義問題」也屬於廣義的宗教之功能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意義問題的探討更有哲學旨趣與意味，且宗教社會學領域中的這兩種傾向也一直有較明顯的界限。

決的理論問題。就實證研究而言，從研究的對象上看，基督教多於其他宗教包括民間宗教；<sup>42</sup>從地域上看，田野點的選擇東部、南部多，西部、北部少；從方法上看，質化（定性）研究遠遠多於量化（定量）研究；從成果的質量上看，側重事例和羅列數字的調查報告多，缺乏理論的歸納與提升。<sup>43</sup>可以說，新世紀之前的各類調查報告，「基本上是在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研究以及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絕緣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些研究者沒有參與到一個國際學術的環境中來，也沒有有意地與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進行交流。它們是中國的宗教研究者在自發的狀態下，根據常識以及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對中國宗教所進行的一種調查和分析。」<sup>44</sup>新世紀之後，這種狀態已經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時，一些學者不僅有了理論衝動和問題意識，自覺地利用現有的解釋宗教現象的理論，而且還開始有意識地在自身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反思這些理論。有的學者還專門撰文強調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方法。<sup>45</sup>但是，就學科整體情況而言，全面的宗教社會學學科意識還是不夠的，從事研究的學者素養參差不齊，許多研究者仍然缺乏系統的專業訓練。

---

42. 可參見陳彬，〈當代中國宗教的實證研究十年略評〉。陳文中提到：「對基督教（包括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實證研究最多（有二十多篇相關論文），民間信仰和佛道教的實證研究較少（兩者相加共計十五篇左右的相關論文），而只有一篇研究論文涉及伊斯蘭教……」；黃劍波，〈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基督教的經驗性研究述評〉。黃文提到：「在收集到的一百二十篇基督教實證研究論文中，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二年為四十篇，二〇〇三年以來有八十篇，在差不多同一時段內增長了一倍。」陳文與黃文均為未刊稿，在此表示感謝。

43. 參見陳彬，〈當代中國宗教的實證研究十年略評〉。

44. 參見吳梓明、劉義，〈中國大陸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載《輔仁宗教研究》3（2006），頁131-156。

45. 可參見李向平，〈實證研究方法與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取向〉，載《基督教文化學刊》11（2004）；黃劍波的兩篇未刊稿：〈身份自覺——經驗性宗教研究的田野工作反思〉和〈經驗性宗教研究中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

從學科發展來看，無論是在國家級還是省市級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還是在高等院校，對於宗教學理論和宗教學各分支學科（當然包括宗教社會學）的系統教學和研究，遠遠趕不上對各大宗教史的教學與研究。在高等院校，宗教社會學還沒有被納入學科培養計劃，宗教社會學專業的研究者屈指可數。然而，這一學科需要我們自己的專業人才，需要適合於我們自己的專業教材，需要有更多的可以走出書齋進行調查的資金和人員條件，需要展示其成果的暢通的出版渠道。這些，似乎都是這門年輕的學科在中國極需克服的難題。

## 2. 極需重視與改進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進路需要相應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特殊價值就在於提供探究宗教的合乎實際或事實的方法，有助於我們超越個人的偏見和眼界。一般而言，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體系包括三個研究層次，即方法論、基本方法、具體方法。其中，方法論層次主要探討理論公式、基本假設、研究邏輯、原則規範等；基本方法則是研究方法，指的是貫穿整個研究過程的程序步驟或者是研究的手段和途徑等，其中又可以分出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統計研究（定量研究為主）和實地研究（定性研究為主）；至於具體的研究方法，則是指社會研究之中使用的具體方法技術、包括資料的收集方法、分析方法乃至其他的技術手段和研究工具，諸如觀察、訪問、問卷、抽樣、實驗等方法均可以包含在內。<sup>46</sup>

---

46. 參見范偉達，《現代社會研究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39-41；亦可參見巴比著，邱澤奇譯，《社會研究方法》（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就目前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來看，其最大問題在於，還沒有進入宗教社會學的方法論體系。綜觀這一領域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大致可以作出如下總結：方法論缺失、基本方法不足，具體方法有待改進。

也許在這門學科的起步階段，方法論層次上的缺失應該屬於正常現象，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由於翻譯介紹的不足，國內研究人員仍然缺乏系統的社會學方面的訓練等原因，我們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對於理論公式、基本假設、研究邏輯、原則規範等的探討。在基本方法層次上，少數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也在作出努力，這一點尤其反映在已經出版的屈指可數的宗教社會學專著中。但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應用研究和統計研究，理論研究卻非常不夠。換言之，我們的研究還有很大的局限性，還不可能較全面較準確地掌握中國宗教的現象，因此也還沒有提出能夠合理解釋這些現象因而能夠得到較多共識的理論。大多數這方面的文章，可以說仍然處於「調查報告」階段，其形式還停留於隨意性的田野調查。儘管在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中，許多學者也用了各種具體的社會學方法，但是在這方面也存在着有待改進的問題。

首先是進行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比較淡漠。不少文章反映出缺乏事前的選題思考這一重要步驟，好像在田野調查中看到甚麼就記下甚麼，最後的成果只是一些材料和事實的堆積，其學術價值自然非常有限。<sup>47</sup>第二，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在選擇田野調查的對象時，學者們無法嚴格按照學術規範去進行，因而在這一選擇中存在着研究的對象不具代表性或普遍性的特點。這種研究結果的價值

---

47. 關於如何選題，可參見本期楊鳳崗文〈在中國從事宗教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論的總結和元方法論的反思〉。

也因此而大打折扣。第三，在從事參與觀察和調查訪問時，沒有明確的「身分」意識，即沒有明確意識到研究者應該站在甚麼立場，持一種甚麼態度。完全的「局外人」或「旁觀者」可能會使自己的觀察不那麼到位，對研究對象缺乏全面的理解；完全的「同流」或「合一」，又可能走向另一種極端，可能對其研究對象缺乏客觀態度。當然，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的身分才是正確的，不過這種身分本身具有張力，絕不是可以輕易做到的。<sup>48</sup>第四，在一些問卷中，所問的問題過大、過於抽象，或者不是一般信徒都了解的問題（如「你認為宗教對於經濟有影響嗎？」，事實上，並不是每個受試者都完全了解這些概念的含義或這麼龐大的問題），因此即使選擇了答案也缺乏可信度，因而達不到提問題的目的。第五，在選擇研究整體中的樣本時，絕大多數的抽樣事實上是隨意的、而非隨機的。因此這類研究結果的科學價值也受到影響。具體方法上的類似問題還有許多，在此不一一指出。

事實上，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進路並不是一條容易輕鬆的道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社會學素養，受過一定的社會學訓練。而這一點，正是宗教社會學研究在中國最缺乏的。因此，目前我們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收集材料和簡單的數據分析階段，還談不上具有科學性的量化研究。上述方法上的不足和運用具體方法時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宗教社會學領域的成果：多數研究結果仍然只有「點」上的特徵，沒有總結出「面」上的意義，有相當多的研究還僅僅停留在經驗階段，沒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仍然將田野調查作為目的而非工具。一言以蔽之，與宗教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我們仍然缺乏，因此也在期待着以實證研究

---

48. 可參見黃劍波，〈身份自覺〉。

為基礎，有理論分析、有問題意識，能夠比較合理地、全面地解釋中國宗教現狀的有影響的著作問世。

### 3. 任重而道遠的未來

當回顧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走過的歷程時，我們不禁要問：在這個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甚麼樣的因素是最重要的、甚至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呢？甚麼樣的因素對於這個學科未來的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呢？有學者認為，「學術協會、大學章程的變化、在教學中對新科目的引進、研究中心的成立、廣泛研究的開始，以及雜誌和出版的創立。所有這些，為一門新學科在大學團體之內外提供了重要性、可視性和共識性。同時它們也帶來了人力和財力資源，而這些資源有利於建立一門社會科學新領域這樣一個艱難的任務。」<sup>49</sup>

不可否認，我們希望當今中國的大學能夠開設宗教社會學專業。在發達國家，宗教社會學幾乎在各大學都有一席之地。我們希望成立學術協會，一個中國宗教社會學學會。<sup>50</sup>我們也希望創辦一本專業學刊，希望編寫此學科的教科書，期待培養出更多的後來人。我們更希望擴大國際交

---

49. 希普里阿尼著，高師寧譯，《宗教社會學史》，頁163。

50. 宗教社會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協會有「宗教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SSR])、「宗教社會學學會」(Association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SR])、「宗教研究學會」(Religious Research Association [RRA])。這三個學會都設立在美國，而開始時只是地方性的學會或有特定範圍的學會。但隨著此學科的發展，它們也逐步發展。現在它們以定期舉行世界性的大會、廣泛討論大家關心的話題，交流研究成果，出版刊物(如由宗教科學研究學會創辦的《宗教科學研究雜誌》[*Journal for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由宗教社會學學會創辦的《宗教社會學季刊》[*Sociology of Religion: Quarterly Review*]，由宗教研究學會創辦的《宗教研究評論》[*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等方式，團結了世界各國的宗教社會學研究者(其中包括宗教界的學者)。此外，許多國家也有自己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機構，如在歐洲大陸的「國際宗教社會學學會」(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SISR])和英國的「英國社會學學會宗教社會學研究社團」(Sociology of Religion Study Group, British Sociology Association)等等。這些團體都有自己的刊物，為其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窗口。

流的渠道，讓更多從事這一行的學者走進來，讓年青的中國學者走出去。

然而，從這一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經歷來看，也許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來自大的社會環境。歷史的經驗證明，社會政治歷史條件的好壞，直接決定了中國宗教學研究的興衰，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命運是與中國社會的開放或封閉、開明或保守相關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抓住今天的一些機會，放棄自身團體的某些利益，同心協力一起來策劃中國宗教社會學未來的藍圖。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結果，不僅有利於中國宗教的正常發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作用於社會歷史，可以對國家的社會政治歷史條件發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我們每一個研究者，都應該有一種更高、更廣的情懷，在堅持此學科的實證性、科學性，堅持我們自身的學術獨立性的同時，關注中國宗教的現狀，關注中國宗教與中國社會的關聯，關注世界宗教新格局對中國宗教的影響。當然，我們還應該加強對宗教社會學領域最新理論成果的介紹，應該具有用我們自己的研究來證實、反思、質疑、推敲甚至修正前人已提出的理論的意識和勇氣。

要實現這種學術願望，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走出書齋，只是中國宗教社會學者的第一步，而走向成熟，既是一個漫長的、需要大家付出大量努力和心血的過程，也是一個需要理論探索、不斷昇華的過程。

作者電郵地址：[gaosn@cass.org.cn](mailto:gaosn@cass.org.cn)

#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GAO Shining

M.Phi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Abstract*

Sociology of religion was a new discipline to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in 1980s. This article looks back to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Moreover,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gnition of its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is discipline in China.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may to some degree exert some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ns as well as of the Chinese society.